

饮水不忘挖井人

——深切悼念周林同志

2018年3月16日，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周林同志驾鹤西去。这是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事业的重大损失，我们表示深切的哀悼！

饮水不忘挖井人。我们悼念和追思周林同志，因为他和他所在的中国科协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是我国城市科学研究的发动者，也是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成立的主要倡导者和推动者。曹洪涛同志曾经在一次谈话中满怀深情地指出：“从源头说起，城科会的成立，真正起倡导作用，从思想上垫底的是（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于光远、钟林和周林这三个人，没有这三个人，城科会不可能很快建起来”。1981年6月开始，在于光远同志的指导下，钟林和周林同志连续主持召开了一系列学术座谈会，吴良镛等著名专家参加了讨论，从自然辩证法的观点研究城市发展战略。1982年年底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召开了全国城市战略思想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得到了全国城市有关方面的热烈欢迎，得到了中央的认可。会后根据中央领导的指示，开始筹备并在1984年1月正式成立了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建设部的有关领导和吴良镛教授等成为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的领导。

城科会的成立适应了我国城镇化发展的需要，可以说是应运而生。在这个过程中，周林同志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85年他主持编辑出版了《城市发展战略研究》，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研究城市发展战略的第一本理论学术论文集，填补了学术界城市发展研究的空白。在以后的岁月里，周林同志长期关心和支持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的发展，在研究会成立二十周年之际还专门撰写了《城市的觉醒》一文，重申了城市问题的重要性、城市规划建设管理需要辩证法等观点。

城市科学研究是时代和国家赋予我们的使命，我们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识城市，指导城市按科学规律规划建设管理。中国的现代化，是对城市认识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我们还远没有完成这一过程。城市科学所担当的全社会城市启蒙的任务仍远未完成，仍任重而道远。近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我国城镇化和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做出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党中央深刻指出：必须认识、尊重、顺应城市发展规律，端正城市发展思想，切实做好城市工作。这是新时代我国城市发展与管理的根本指导思想，必须在改革与发展中认真体现。

周林同志走了。他是一位高水平的思想者、学者和实际工作者。我们要学习他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科学精神，学习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继续大力发展城市科学，奋力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征程，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今天，我们重新刊发《城市的觉醒——为纪念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成立20周年而作》一文，以是纪念！

城市的觉醒*

——为纪念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成立20周年而作

周林

1848年11月，有一个青年在由巴黎步行到瑞士伯尔尼的途中写了一篇文笔优美的随笔。在这篇随笔中，他把巴黎这个

作为欧洲文化中心的城市作了极富感情的描写，说它是“城市中的珍珠”。这个青年就是恩格斯。所有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和著名活动家马克思、恩格斯，包括列宁和斯大林，在谈到城市在推动人类社会、经济、文化进步中的重大作用时，无不由衷地感到欣喜。

*本文首次刊发于《城市发展研究》2007年增刊，本次重新编辑刊发

1. 城市问题的提出

我是一个政策研究工作者，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先是研究农村政策，以后是工业、科技问题。一生中很大一部分时间是在核工业的建设和发展中度过的。1980年我从核工业转入中国科协系统，调到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工作，开始进入学术工作的历程。当时研究会正处在初创时期，已在医学辩证法和农业辩证法等领域开展学术研讨活动，收到很好的效果，正准备开辟新的领域。在一次研究自然辩证法学术活动年度工作安排会议上，当时主持研究会工作的钟林同志要我负责组织开展工程技术辩证法的学术活动。由于我刚到研究会工作不久，对自然辩证法学术领域的许多问题都不太熟悉，感到工程技术问题涉及的学科面太宽，主题最好集中一些。正好这时报上报道了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北京城市规划问题提出了新的思路和要求，城市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于是我建议先组织开展关于城市辩证法学术研讨，这个建议得到钟林同志和其他同志的赞同。具体组织工作钟林同志分工由我负责进行。

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思维方法的科学，一向受到中国学术界的崇敬。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是在“文革”之后，拨乱反正时期，经于光远、周培源、钱三强三位著名学人建议，邓小平同志批准建立的学术组织。研究会在开展学术活动中有一个成功经验，就是研究工作者和专业工作者相结合。自然辩证法的研究队伍主要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科学院的专业研究人员与大学自然辩证法教学人员所构成，有一定研究基础。但是要使这一课题的研讨能够紧密联系城市建设和发展的实际，有一定深度，在现实工作中能够发生作用和影响，很重要的要加强同城建方面的领导和专家的结合。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解决的又是同城建系统领导部门的联系和沟通问题。当时国家主管城市建设的领导机关是城市建设总局。这时我想起城建总局有一位秦仲方副局长，是一位老同志，解放初期在川北地区工作，任行署副主任。我那时在川地区党委工作，后来在参加川北地区党史工作会议时又与他有所接触，便给他写了一封信，并到他家中拜访，争取城建系统领导的支持。城建总局领导对开展城市辩证法研讨很热情，包括局长邵井蛙和主管城市规划的副局长曹洪涛，不仅亲自参与，还从多方面提供支持和帮助。当时国家机构正在改革，撤销总局成立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部长李锡铭和副部长廉仲、储传亨对城市学术活动的开展也是热情支持的。还有北京市城市规划局局长周永源等领导同志，他们对城市学术活动也是大力支持的。没有他们的热情支持和积极参与，城市学术活动那样迅速开展起来，是不可能的。那时全国改革形势已经形成，各方面工作都出现新气象，社会上出现一种说法，要取得改革的胜利需要权力和智力的结合。改革是如此，在繁荣学术中，我们也深感领导机关和部门支持的重要性。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城市文明的国家。在经历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战争即将取得全面胜利，新的人民共和国即将成立的前夜，中国革命的卓越领导人毛泽东就指出：“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但是，由于“左”的思想的影响，这一关系到国家未来发展富有远见的思想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消灭“城乡差别”被理解为城市应当向农村看齐。“人人都有两只手，

不在城市吃闲饭”，城市被认为是吃闲饭的地方。建设方针是“先生产，后生活”，市政建设项目往往排不上队，乃至被生产性项目挤掉。在“左”的干扰严重时期，甚至一度发生城市建设领导机关被撤销，城市规划工作被停止的情况。这种情况以后虽然有所改变，但仍然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车轮已经启动，并滚滚向前的时候，城市发展、建设、管理的严重滞后，日益突显出来。一些先期进入改革的城市，大量的矛盾和问题涌现。如何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深化认识和理顺这些问题，寻求解决矛盾和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唤起社会共识，推动城市的建设和发展，这是学术工作的社会责任。经同各方面洽商，决定这项学术活动分两步进行。先召开北京、上海、天津三市城市发展战略座谈会，再召开全国城市发展战略思想讨论会，并在两会准备过程中举行几次小型座谈，加以推动。

2. 城市建设需要辩证法

一个新的学术思想的提出和发展，需要形成相应的学术氛围。除了运用学术思想座谈外，还要充分发挥相关报刊的作用，包括先期的《自然辩证法通信》和后来的《自然辩证法报》，对一些有启发性的重要思想，采用专访形式，尽先择要发表，以供相关学者、专家和社会人士参考。这些做法，对一定学术氛围的形成，起了必要的推动作用。

北京市城市规划局城市规划专家钮德明是城市建设需要辩证法向我吐露心声和感受的第一人。他说：“多年来，由于‘左’的思想影响，城市建设积累的问题太多，现在百废具兴，矛盾成堆、成山。城市规划工作现在是掉在矛盾的坑里头。怎样从一堆矛盾中理出头绪来，不致有病乱投医，甚至越治越乱，这就需要辩证唯物论指导。”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多年来研究、传播自然辩证法的著名学者于光远说：“城市建设和发展方面的问题很多，有许多实际问题，也有许多认识问题。现在是工作上欠账，研究上也欠账。什么是城市？城市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城市起什么作用？城市发展中的客观规律是什么？这些问题都要用唯物辩证法搞清楚。不仅要研究，还要搞普及；不仅对一般人，也要对决策者。”

著名建筑学家、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说：“城市的建设和发展要立足于国情。我国人口众多，幅员广阔，但城市化的水平很低。这与经济发展的落后有关。城市的问题不能低估。城市的建设和发展要靠科学，但又是长期被忽视的一门科学。鉴于城市问题研究的迫切性，要提高认识，大力宣传，迅速建立我们的城市科学。”

著名社会学家、中国社会学会会长费孝通教授说：“研究中国城市发展的规律，必须注意民族性和时代性这两大特点。要从实际出发。要把宏观研究和具体调查结合起来，不仅要有定性描述，还要有定量分析。要把对城市发展规律的研究同‘四化’和‘两个文明’建设的要求紧密结合起来。”

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顾问，即原城建总局副局长曹洪涛说：“城市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城市发展战略研究应当引起各方面的重视。城市发展战略研究涉及面广，综合性强，需要有关学科、有关部门共同努力。城市建设环境保护部领导将积极支持这一学术活动的开展。”

著名雕塑家、全国美协副主席刘开渠教授说：“城市雕塑

可以对城市建设和城市文明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物质文明程度愈高，精神文明愈要跟上去。”

著名自然辩证法和科学理论学者李宝恒说：“科学要真正在‘四化’建设中发挥作用，必须关心城市发展这样的综合性问题的研究。”

在各次座谈会上，各部门、各系统的同志纷纷联系各方面工作发言。国家体委研究室主任张彩珍在发言中谈到我国城市规划中严重忽视体育设施的建设，已有体育设施被破坏和占用的情况严重，呼吁重视建设体育文明城市。公安部政策法律研究室主任张之轩在发言中讲到城市建设中严重忽视治安、交通、消防等方面的设施问题，亟需有关方面的关注。文化、商业、交通、邮电、环保、人防等方面的同志，都联系相关工作领域，谈到城市这个综合体建设和发展中需要思考和关注的问题。与此同时，一些城市如北京、天津、南京、福州和哈尔滨等也先期开始了学术座谈，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和建议。特别感人的是清华大学副校长、著名水利专家张光斗教授，早在1981年初，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刚开始酝酿这个问题，看到《自然辩证法通信》上刊登“城市建设需要辩证法”对钮德明同志的专访文章后，就主动来信，对如何深化认识这一问题提出意见。这种先期活动，对逐步深化主题认识，吸引社会广泛参与，推动各有关方面对相关问题的深入思考，都是有益的。这就为大会的成功召开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为了扩展对城市建设需要辩证法的认识，我们还在《自然辩证法通信》上发表了为国际建筑学界推崇的著名的“雅典宪章”，即国际现代建筑学会于1933年在希腊雅典拟订的《城市计划大纲》。这个重要文献的出现已经半个多世纪了，但是其中许多原理对今天的城市规划、建设和发展，还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更可贵的是在文件“引言”中，把“互相联系的”和“不断变化的”这两个基本观点，作为观察和认识城市问题的基本指导思想。这同辩证法“普遍联系”和“发展变化”的基本原理，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是完全一致的。这说明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与城市建设和发展的客观内在规律的必然联系，这种认识是中外学者相通的。

3. 开展城市发展战略思想的研讨

全国城市发展战略思想讨论会是1982年12月19日至24日在北京举行的。在此之前的北京、上海、天津三市城市建设辩证法学术座谈会，是国家城市建设总局和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筹委会联合召开的。这次会议就成为国家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和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联合召开的。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以城市为主题召开的大型全国性学术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全国大部分省市自治区、中央国家机关各有关部委、各有关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学术组织的领导干部、专家、教授、学者共180多人，云集了多年来在我国城市建设、管理、发展及相关领域辛勤耕耘的著名学者和专家，费孝通、于光远、张光斗、任震英、吴良镛、周永源、廖季立、秦仁山、郑孝燮等出席了会议。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地理系主任侯仁之因故未能参加会议，送来了他多年来研究古都北京历史变迁和改造发展的学术论文。许多专家学者在会上大声疾呼，要重视城市科学，发展城市科学。城市发展中的许多重大学术理论问题，包括中国城市化的道路、城市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等问题的研究，长期被忽视了。应当迅速

改变我国城市科学研究的落后面貌。城市是一个广阔科学领域，涉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许多学科门类。城市科学的发展应列在国家科学发展的重要地位。经济、社会、科技、文化、教育、建设、环保、卫生、体育、市政、治安、人防等各界的学术理论工作者要联合起来，紧密合作，加强理论研讨。要大力加强城市科学人才的培养工作。要积极开展与国外城市科学研究的沟通与交流。“柳暗花明又一春”。各有关方面携起手来，共同努力，建立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中的新兴的城市科学。

这是各级领导和专家相结合，共同研讨城市在国家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会议。参加会议的不仅有国家和一些重要城市城建部门的领导人、主管城建工作的副市长，包括城市建设环境保护部的正副部长、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既是城市规划和建筑专家又是兰州市副市长任震英，还有5位市委书记——武汉市委书记吴官正、沈阳市委书记李铁映、贵阳市委书记朱厚泽、重庆市委书记于汉卿、福州市委副书记袁启彤主动报名参加会议，这是这次学术会议的一个新亮点。作为主管城市全局工作的党的领导人，学习城市、研究城市、参与现代城市问题的学术研讨，开展思想交流，提高城市理念，这标志着城市工作的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与会同志一致认为城市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是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科技、教育、商贸、交通、信息中心，是国家和地区前进、发展的动力。城市是推动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多重结构体系，在国家现代化建设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城市领导农村。没有城市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没有经济、社会、文化和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四化”建设是国家发展目标，没有城市现代化，“四化”目标就不能实现。

这是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研究城市发展规律，探讨城市建设和发展的会议。整个会议洋溢着唯物辩证法分析城市、研究城市、认识城市、探求城市发展规律和战略的热情。全国政协城市建设组副组长曹言行以“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为题，论述了城市发展中的几个重大问题；城乡建设环保部部长李锡铭用分析和综合的方法论述了城市建设的方方面面，指出只有搞好综合，才能提高城市的效能，提高城市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吴良镛教授用丰富的古今中外材料论述了城市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重大作用，指出城市是人文荟萃之地，是变革的中心。德国古典哲学家费尔巴哈晚年隐居乡村，断绝了参与学术思想交锋和人文社会交流的条件，哲学思想也枯萎了。一批来自北京、上海、山东、浙江、重庆等地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学者关于“城市的本质”、“城市的特色”、“城市的效率”、“城市的质量”、“城市的体系”等主题的论文，用深湛的哲学思想和丰富的现实材料研究了认识城市和发展城市中的一些本质性的问题，深化了对城市的认识，展示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分析认识城市这一人类创造的复杂巨大的人工自然综合体的新的境界。辩证唯物主义推动了城市科学，城市科学也推动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发展。

这是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同在城市规划、建设、发展、管理第一线工作的专家学者共同探讨我国城市发展的会议。感谢中共中央研究室于若木同志和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周干峙同志，是他们的信息沟通，使这次会议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注。一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城市建设部部长，时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万里同志；一位是在主持天津市委、市政府领导工作期间就着力抓城市问题，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的胡启立同志。为了便于座谈和对话，根据中央领导同志

指示，邀请了部分专家学者参加。接见和座谈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由于有的同志，如任震英、周永源、周干峙等同志，他们多年来在城市规划和建设岗位上工作，万里同志同他们很相熟，因此座谈会开得气氛亲切热烈。座谈开始，按照会议领导小组经城建部领导提议的安排，由我首先汇报会议情况和大家关心的问题。接着由与会同志发言。中央领导同志仔细听取了大家的发言，并不时提问和插话。最后中央领导同志讲话。

万里同志首先深情地回忆起北京城市早期改造的情况。长安街扩宽工程是大家关心的重点问题之一。当时确定街宽为40米，有人提意见，说太宽了，现在看来并不宽，时代在前进啊！万里同志在讲话中重点讲了党和国家的城市政策。他说，城市的地位很重要。城市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领导农村。要更好的发挥城市的经济中心、文化中心、科学技术中心的作用。大城市要控制发展和进行改造。中等城市除了要建设和改造外，也有一个控制发展问题，要更好地发挥地区中心的作用。小城镇建设要跟上去，要建设星罗棋布的小城镇。现在农村商品经济发展很快，必然形成农村的经济中心、商品加工中心、服务中心、科技中心和文化中心。要严格按照城市规划办事。计划工作要重视城市，要使城市规划和国家计划密切结合。城市建设要有群众观点，要代表人民的利益。改善生活环境、防治污染也是人民的根本利益。

胡启立同志说，万里同志接见这次学术会议代表，就是表示对会议的支持。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发起研究城市在“四化”建设中的作用，我非常赞成。在城市建设和管理上如何按照中国自己的国情，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发展道路，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大问题。要从实际情况出发，以改革的精神来对待这个问题。

参加接见和座谈的还有国务院秘书长杜星垣和国家计委、国家经委领导吕克白、马仪等同志。由学术团体发起，与国家机关联合召开的全国性学术会议有中央领导同志这样明确表示支持，并且对会议讨论的问题有这样明确肯定的答复，是很少有的。这次会上还研究了组建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的筹备机构问题。建立全国性城市科学研究促进机构的航程，在多方企盼下开始起步了。在新华出版社支持下，会后不久就编辑出版了《城市发展战略研究》论文集。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研究城市发展战略的第一本理论学术文集，填补了理论学术界长期缺乏城市发展研究的空白。现在来看，这本文集在理论学术上也是有深度、有价值的。

4. 一个城市重大发展的时代来临

这次城市学术会议能够成功召开，有一个很好的工作集体，有几位同志的工作是必须讲到的。一位是吴良镛教授，他是会议筹备组的领头人，他有深厚的学术功底，知识渊博，思想非常开阔。他对城市科学的开展有许多新的思想，筹备会议上几次启示性的发言，把大家的思想带到新的境界。一位是钟林同志，他是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实际工作负责人。他有丰富的学术

组织工作的经验，是他组织团结了一支自然辩证法研究队伍，为这次辩证法与城市科学结缘，使会议成功召开做出了贡献。一位是多年来在城市规划和建设领域里潜心研究的陈为邦同志，他熟悉中国城市的方方面面，善于从学术深度归纳思考城市问题，在会议进程中几次发言对人们了解认识城市问题的全局提供了帮助，并为这次战略思想会议的成功召开做了许多工作。还有许多同志对这次会议的关注、支持和帮助是十分感人的。作为一个学术工作者，我对每一个热爱科学、热心学术的人，由衷地表示敬意。

在各方支持和积极参与下，1984年1月20日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宣告成立了。这一期间，许多省、省会城市和地区中心城市也先后成立了地区性城市科学研究会。国家举办的“市长学习班”也正式开学。许多城市领导把学习城市、认识城市和更好地发展城市纳入议事日程。相关高校扩展了城市科学研究教学内容，扩大了城市建设人才的培养。我国城市科学进入了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社会公众、研究与普及相结合，在更加广阔的基础上走向繁荣发展的历史新时期。所有这些都与新时期我国城市发展的多方面要求相联，预示着一个城市重大发展的时代来临。

为建立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催生而召开的全国城市发展战略思想学术讨论会，已经过去20多年了。中国城市出现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中国和世界城市发展历史上，都是一个奇迹。以深圳为代表的中国经济特区城市的崛起，上海这个东方商贸城市在十多年中迅速发展成为对世界经济发生影响的“全球城市”（Global City），在环太平洋西岸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湾地区一大片高质、高效、极富发展竞争潜力的城市群团的兴起，不仅加速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世界经济乃至政治战略的格局。这启发人们深思，使我想到城市这个高度集约化的人工自然体是有高度生命活力的。它不仅是人类智慧的产物，而且凝聚、扩展、升华了人类智慧，回报人类，给人类社会带来前所未有的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据最新考古发现，中国城市出现已有7000年历史，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又曲折的发展进程，现在又赢得了新的发展时期，这标志着中国城市的觉醒。

由现代城市发展带动和推进的全国城市化进程，离不开乡村发展提供的鲜美丰富多品种食物及其他生活物质资源、受到良好保护的大自然源源供给的清新空气、青山绿水稻麦飘香的田园风光、鸟语花香禽畜游栖的生物多样性世界。一个田园荒芜、民生凋敝的乡村是不利于现代城市发展的。现代城市意识认为，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的一个伟大变革进程。城市在有序地吸纳乡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建设城市、发展城市的同时，又在知识、科技、资金、流通等多方面回报乡村，支持乡村发展。城市领导乡村，城乡互助，协调发展，这是城市觉醒的重要方面。

（2003年9月30日于北京）

周林同志生平

周林，原名周龙龄、周龙林，1929年5月17日出生于四川广元，1950年5月参加工作，1952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中共川北区党委组织部、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二机部（核工业部）、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科普研究所等机构工作，2018年3月16日，周林同志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



周林少时天资聪颖、志向高远，虽家境贫困，但酷爱读书，因为家中无力支持他继续上学，他十几岁离家，带着他读过的书沿途贩卖，靠打工和给人刻铜板，饥一顿饱一顿勉强维生，在短暂上了小学、初中之后，依靠不断自学，考入川北大学土木工程系学习。四川解放后，他万分欣喜，积极投身革命建设事业，并于1952年入党，在胡耀邦领导下的川北区工作，先在川北日报，后调中共川北区党委，再后调中共中央西南局农村工作部担任部长秘书，其间经常随部长下乡调研，写调查报告。工作中周林十分注重实地调查，实事求是，关注农民利益。

1955年，周林调北京入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工作，后赴二机部（核工业部）任副部长秘书，从事政策研究等工作，曾为部领导起草多份文稿。周林后在核工业部办公厅的政策研究室工作，并编辑《跃进报》，其间他多次到工厂调研，撰写核工业发展政策相关报告，二机部工作条例（草案）初稿即是他主持完成的，同时他也是二机部关于“自力更生发展原子能事业九条经验”的主笔之一。他重点研究科技攻关，技术政策，推出了厂所结合的思想，为我国两弹技术的突破做出了重要贡献。“文化大革命”期间政策研究室撤销，他被下放到陕西合阳五七干校，1972年他恢复工作回到北京二机部的“工业学大庆”办公室做调查研究组织等工作。

1978年周林调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任副秘书长。其间，他与人合作主编《中国自然辩证法历史和现状》三辑文献，合作主编《科学家论方法》两辑，并邀请到钱学森破例为此书作序。此外他还负责编辑《自然辩证法报》，亲自撰写了包括《不能让一江春水白白向东流》等十九篇科学家专访文章，聚焦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

1982年，在改革开放、拨乱反正的大形势下，他以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名义着力倡导推动城市研究，当年12月19—24日，研究会和国家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联合组织召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全国城市发展战略思想讨论会。周林对这次会议从筹划，参会人员到会议组织倾注了大量心血，讨论会非常成功。中央和地方一些领导以及许多著名学者参会，这次会议明确了城市在国家 and 地区发展中的中心作用，影响深远。随后周林编辑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城市发展战略文集》，促成了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和部分地方城市科学研究会成立，

这些机构成为研究城市发展、城市政策，宣传、推广城市知识的强大力量。

1986年12月，周林调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历任办公厅副主任（主管调研室工作），中国科协研究中心代主任（正局级）、研究员，长期为中央领导和中国科协领导起草讲话稿以及撰写科协重要工作的调研报告，并负责主编《科协通讯》、《科协情况》等科协机关内刊。周林是江泽民主席在中国科协“四大”讲话的起草小组人员之一，并参与起草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纲领和李鹏总理在国家“七五”科技攻关总结表彰大会的讲话。

这一时期，周林的学术视野和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大，他经常深入调查，写过许多脍炙人口的文章，他学术涉及面广，思维活跃，立意创新，有些文章曾经被中国创新与发展研究所收入文库，也有些被中国人文科学当代改革丛书的专家评为一等奖，《人民日报》和《瞭望》杂志也发表过他的署名文章。宋健、钱学森、朱光亚等领导都曾对周林的文章专门写信表示过赞赏和关注。周林著文众多，代表性作品包括：《实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一场深刻的革命》，《中国的城市改革和发展》、《城市的觉醒：记二十年前中国城市大发展前夜的一场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研讨城市发展的学术盛会》、《一个深远意义的变革——产业从这里兴起》、《科普兴县——一个又治穷，又治愚的大道》，《科技创业呼唤微小银行》、《科学技术与精神文明》、《走向知识经济时代的科普工作》、《中国农业的三环结构》，等等。

周林头脑活跃，喜欢思考遇到的各种问题。他长期为科协等部门起草重要文稿，这对执笔人的知识积累、概括综合能力、笔底功力都要求很高。周林一心扑在工作上，长年累月加班加点至通宵达旦，不计报酬、任劳任怨。1991年退休后，仍然牵挂工作，关注社会，他不辞辛劳多次外出到农村调查，笔耕不辍。他关于科普兴县、农村专业协会的文章就写成于这个时期。他的许多文章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显示了他的思想认识的前沿性，反映出他一生思考和探索的广度和深度。

周林在工作中是个勤奋的人，在生活中，则是一位慈祥的好父亲好祖父，他喜欢为家人细致地做家乡小面，对儿女事业的发展给予建议但从来不乱插手，并始终给予精神上的支持、鼓励和帮助，一贯宽厚温良。他退休后多次到美国探亲，在享受与儿孙的天伦之乐时，饶有兴致地走访了美国许多地方，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和好奇心。周林关爱家乡亲人，他生病期间，还多次回四川老家探访。也有多位亲友从四川前来看望他。高龄之后他虽然听力、记忆力丧失多年，依然温存有礼，努力配合家人。每次客人来访他都很高兴，虽然阿尔茨海默病后期的他已经不识别访客，但还是非常礼貌，关心客人的起居饮食，直至生命最后。

周林的一生，是一心一意、任劳任怨为党工作的一生。他毕生热爱学习、勤于思考、勇于探索、涉猎面广、知识渊博，在核工业、中国科学方法论、城市、农业、科技、科普政策研究、科技史等很多领域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斯人虽去，风范犹存，周林同志光耀的人格魅力和宝贵的精神财富将永留人间！